

冷战后官方发展援助的决定因素

何帆 唐岳华

自二战结束之后，对外发展援助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渐重要，成为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改善国际环境，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以及维护世界和地区经济稳定的重要政策工具。对外发展援助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一直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目标、功能和手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援助数额逐步增加，在世界对外援助体系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为此，研究发达国家的外援政策与外援实践，将有助于中国制定成熟的对外发展援助战略。

一、既有研究回顾

战后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类型包括官方发展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援助等等。其中，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s, 下文简称 ODA）是战后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主体。按照目前的定义，ODA 是由官方机构（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或其执行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受援国名单

《国际政治科学》2007/4（总第12期），第61—84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national Politics

上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多边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目前,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对外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委)是当今国际社会发展援助领域的主导机构之一。发援委的22个成员国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主要的ODA援助国,在对外发展援助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从研究内容上看,有关发展援助的研究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关注援助政策对受援国的效果,即能否有效地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社会发展;目前,国内学者尤其是国际政治学者对发展援助问题的研究大多属于此类。比如,周弘对对外援助领域的几种主要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提出援助国不仅占有资金、技术、设备等硬件方面的优势,而且还具有管理经验和人文观念等软力量,因此援助国可以借助外援资金流动的网络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多层次的扩散和渗透。

另一类文献则是研究对外援助政策的决定因素,即国家为什么提供援助。例如,刘丽云对对外发展援助背后体现出的国际政治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对发展援助动因和方向有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讲,有关发展援助决定因素的研究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双边发展援助分配的决定因素,即各援助国对哪些国家提供援助、提供多少援助及其决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共有23个成员,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欧盟委员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其中,欧盟委员会并非一个国家,本文中所涉及的DAC的22个成员国是指除欧盟委员会以外的22个国家。

支持对外发展援助的主要著作可参阅 Jeffrey Sachs, *End of Pov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反对对外发展援助的主要著作可见 William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周弘:《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欧洲》2002年第3期,第1—12页。

刘丽云:《国际政治学理论视角下的对外援助》,《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第83—88页。

因素等问题；二是多边发展援助的决定因素；三是援助国总体援助水平的决定因素，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援助国总体援助水平的决定因素问题，本恩托克（Michael Beenstock）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发现，援助国的援助决策与该国的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包括失业率、国际收支状况、中央财政预算状况以及GNP增长率有紧密关系。其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尽管用多元回归方法可以认为失业率、中央财政预算状况是一国ODA总规模的重要解释变量，但是这一结论能否被其它方法证明？从数据特点看，如果我们分析不同国家在一段时期中的总体对外援助，则这些数据是面板数据，更宜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事实上，博希尼（Anne Boschini）等人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指出，失业率、中央财政预算状况对ODA并没有影响，从而挑战了本恩托克的观点。希西多（Shuntaro Shishido）和米拿托（Naonobu Minato）则对G7国家发展援助总规模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国ODA总规模可以用各国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经常项目余额、汇率、国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五个变量来解释。但他们的分析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其使用的是各国ODA净额，而不

Alesina and Dollar, "Who Gives Foreign Aid to Whom and Wh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5, No. 1, 2000, pp. 33 - 63; Bandyopadhyay and H. J. Wall, "The Determinants of Aid in the Post Cold-War Er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Working Paper*, No. 2006-021B, 2006; Maizels and M. K. Nissanke, "Motivations for Ai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12, No. 9, 1984, pp. 879 - 900; R. D. McKinlay and R. Little, "The U. S. Aid Relationship: A Test of the Recipient Need and the Donor Interest Models," *Political Studies*, Vol. 27, No. 2, 1979, pp. 236 - 250; McKinlay and R. Little, "A Foreign Policy Model of U. S. Bilateral Aid Alloc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1, 1977, pp. 58 - 86.

E. Neumayer, "The Determinants of Aid Allocation by Regional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and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1, 2003, pp. 101 - 122.

Michael Beenstock, "Political Econometry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orld Development*, Vol. 8, No. 2, 1980, pp. 137 - 144; Shuntaro Shishido and Naonobu Minat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by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XXXII, No. 1, 1994, pp. 3 - 12; Anne Boschini and Anders Olufsgard, "Foreign Aid: An Instrument for Fighting Communis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3, No. 4, 2007, pp. 622 - 648.

Shishido, Shuntaro and Minato, Naonob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by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XXXII, No. 1, 1994, pp. 3 - 12.

是相对值，没有对 ODA 数据相对于各国经济规模进行调整，即没有排除国家经济规模差异的影响；其次，他们是先对 G7 国家的数据分别回归后再进行比较分析，并没有进行统一的面板数据分析，也没有把其它重要发达援助国（如瑞典、丹麦等国家）纳入其分析范畴；第三，他们考查的是 1979 至 1990 年的数据，无法反应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社会对外发展援助的结构性变化。

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博希尼首次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分析了 1970 至 1997 年 17 个 DAC 成员国的数据，对冷战结束是否为 20 世纪 90 年代发达国家发展援助大幅下降的原因进行了经验研究。其研究使用援助国人均 GDP、人口数量、敌对国家的军事开支、上一年度发展援助总额以及一系列控制变量来解释 17 个援助国的援助总额，发现冷战期间（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发展援助总规模与东方阵营的军事开支呈明显的正向关系，但冷战结束后（20 世纪 90 年代）二者之间不再存在这种正向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冷战结束使得发达国家发展援助失去了一个重要动机，从而导致国际社会大幅削减了发展援助的总规模。但是，博希尼的分析也存在两点不足。首先是数据局限，他们只使用了 1990 至 1997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没有考虑冷战结束至今国际社会发展援助的变化；其次，他们存在着与希西多和米拿托相同的问题，即都没有对 ODA 数据相对于各国经济规模进行调整，没有排除国家经济规模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将试图从定量研究的角度探讨一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总体规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使用 1990 至 2005 年 DAC21 个成员国的数据，将当今世界所有主要发达援助国纳入分析范畴，建立统一的计量模型，采用最新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考察对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发展援助相对规模（ODA/GNI 比例）的决定因素。本文之所以没有应用多元回归而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原因在于使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而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得出更为合理的结论。

本文将首先对发援委国家冷战结束后 ODA 的总体概况进行简要的分析，

博希尼（Boschini）选取的 17 个 DAC 成员国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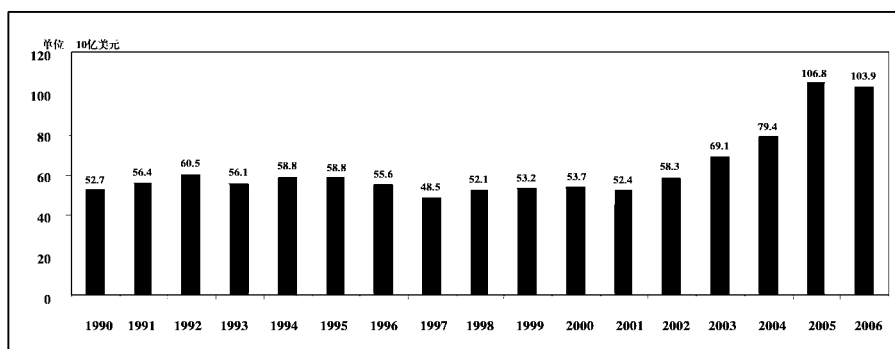
博希尼所指的东方阵营国家为前《华沙条约》的成员国。

之后根据有关的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理论，从援助国角度对影响 ODA 相对规模的因素提出若干假设，并通过散点图进行简要分析；在这些假设和分析的基础上再建立一个 ODA 相对规模决定因素模型，并使用 21 个发援委成员国 1990 至 2005 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最后我们根据分析结果对中国对外发展援助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二、冷战后国际官方发展援助的规模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援助国援助政策、援助对象和援助方式都随之经历着调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动机和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冷战期间主要由意识形态主导转变为由多方面因素决定。

统计显示，1992 至 1997 年发援委 22 个成员国的对外援助总额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低迷状态持续到 2001 年。从 2001 年起，发援委国家 ODA 总额开始快速增长，2002 至 2005 年连续四年的增长率都在 10% 以上。2005 年发援委国家 ODA 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 106.8 亿美元，几乎是 2001 年 52.4 亿美元的两倍。但是到 2006 年，根据经合组织公布的初步数据，受美国和日本援助规模下降的影响，2006 年发援委国家 ODA 总额也略有下降，为 103.9 亿美元（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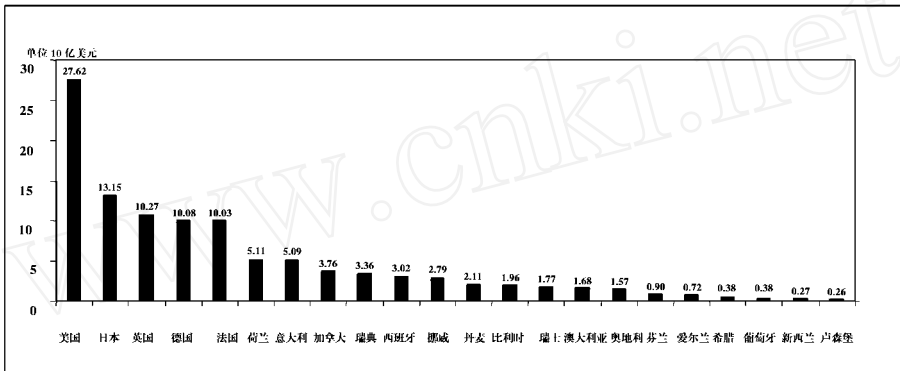


图—1 发援委成员国 ODA 总额（1990 - 2006 年）

数据来源：OECD 's DAC and CRS databases

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除欧盟委员会以外有 22 个成员国，由于数据缺乏，希腊没有被计算在内。

从单个国家援助总金额来看，2005年美国仍是最大的援助国，其后为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2005年，发援委所有成员国 ODA 总规模为 1067.8 亿美元，其中美国 ODA 总量为 276.2 亿美元，占发援委援助总量的 25.87%；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的 ODA 分别为 131.5 亿美元、107.7 亿美元、100.8 亿美元和 100.3 亿美元，分别占发援委援助总量的 12.31%、10.08%、9.44% 和 9.39%；排名前五位国家的 ODA 总和占 DAC 援助总规模的比例高达 67.1%（见图—2）。由此可以看出，在目前对外援助体系下，世界官方发展援助仍主要由少数几个发达强国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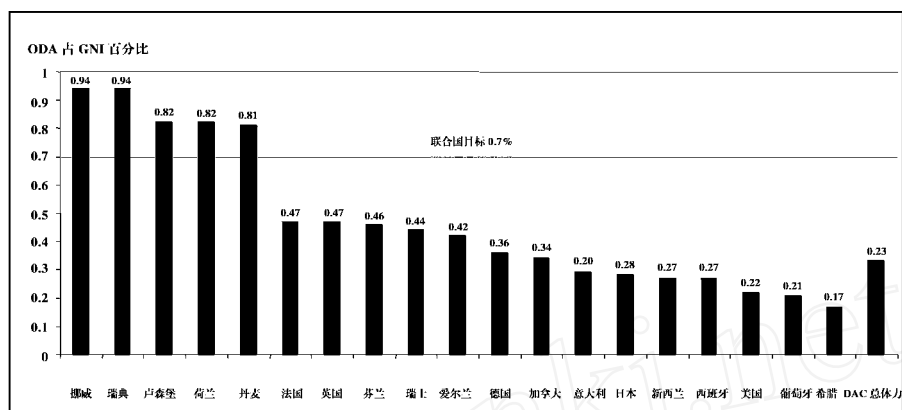


图—2 2005年发援委各成员国 ODA 规模

数据来源：OECD 's DAC and CRS databases

官方发展援助与国民总收入（GN I）的比例是衡量对外援助支出的重要指标。2005年援助国的平均比率为 0.33%，已基本恢复到 1980至 1992年平均值 0.33%的水平，但与联合国设定的 0.7%目标水平仍相差很远。如图—3所示，2005年 22个 DAC成员国 ODA /GN I 比例的平均值为 0.47%，与联合国设定的 0.7%目标水平同样相差甚远。根据 OECD 公布的 2005年的数据，ODA /GN I 比例最高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其 ODA /GN I 比例均超过联合国“蒙特雷共识”所要求的 0.7%，分别为 0.94%、0.94%、0.82%、0.82%和 0.81%，远高于 DAC 国家的平均水平

0.33%。而美国、葡萄牙和希腊为 ODA /GNI 比例最低的国家，分别只有 0.22%、0.21% 和 0.17%（见图—3）。



图—3 2005年 DAC各成员国的 ODA/GNI比例

数据来源：OECD's DAC and CRS databases

三、官方发展援助的决定因素

由于国家规模大小的不同，其 ODA 的总规模差别巨大。为了排除国家规模差异的影响，我们主要考察影响各主要发达援助国 ODA 占其 GNI 此重的因素。

鉴于我们主要考察一国援助的总体规模，并不考察其援助的形式和援助的对象，因此我们着重从援助国方面去解释该国 ODA 的总体规模。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认为对外援助是为了促进本国的安全和主权，抵御国际环境中的敌对势力。摩根索认为，“对外援助政策与外交、军事、宣传等没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国家‘军械库’里的武器装备。”从这一角度来看，那些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处于霸主地位或寻求霸主地位的国家会更加热衷对外援助，

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6, No. 2, 1962.

因此，一国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一国对外经济扩张的程度，以及是否曾经是殖民国家，都会影响到其对外援助的规模。但是，内政同样会影响外交，很多学者指出，一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和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国内政治体制、国内政治博弈影响的。根据这一思想，一国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支出的结构，尤其是用于公共开支的比例，都会影响该国的对外发展援助，因为国内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会反映在财政预算之中。综合这些考虑，我们认为，人均 GDP、经济地位、财政收入、国内公共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状况、经济开放度和历史因素（是否为殖民宗主国等）等可能是影响一国 ODA 相对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七个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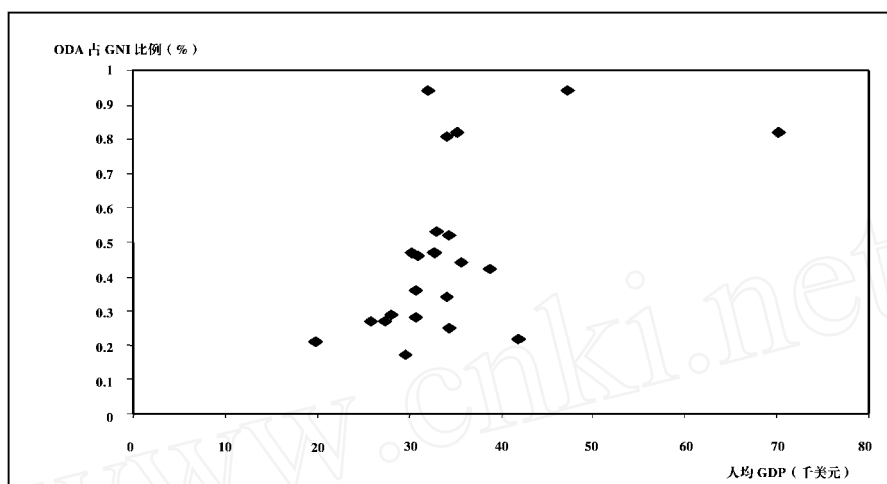
1. 假说一：一国 ODA /GN I 比例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2. 假说二：一国 ODA /GN I 比例与其经济地位相关；
3. 假说三：一国 ODA /GN I 比例与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相关；
4. 假说四：一国 ODA /GN I 比例与国内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相关；
5. 假说五：一国 ODA /GN I 比例与财政盈余或赤字占 GDP 比重相关；
6. 假说六：一国 ODA /GN I 比例与该国贸易和对外投资占 GDP 的比重相关；
7. 假说七：一国 ODA /GN I 比例与历史因素（是否为殖民宗主国等）相关。

（一）假说一：一国 ODA 总体规模占 GN I 的比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经济发展水平是一国进行对外发展援助的内在支撑。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对外发展援助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一国人均 GDP 与其投入的 ODA 是成正比的，即人均 GDP 越高，其 ODA 占 GN I 的比例也就越高，这在散点图（图—4）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05 年 ODA /GN I 比例最高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而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 年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五国人均 GDP 均处于中上水平，分别高达 32111 美元、47207 美元、35120 美元、

Caroll Lancaster, *Foreign Aid: Diplomacy, Development, Domestic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70245美元和 34137美元，其中卢森堡和挪威是 OECD 成员国中人均 GDP 水平最高的两个国家。上面简单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对外发展援助的内在支撑，富国进行对外发展援助的倾向似乎更明显。



图—4 2005年发援委国家 ODA/GNI比例与人均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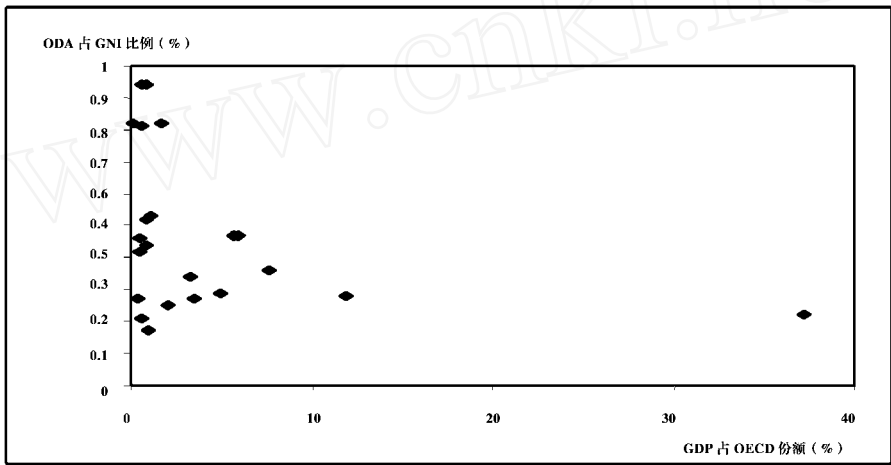
(二) 假说二：一国 ODA 总体规模占 GN 的比重与其经济地位相关

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般用该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例来衡量，本文研究的国家均为经合组织国家，因此我们首先用一国 GDP 占 OECD 所有成员国 GDP 总量的比例来衡量，然后再用一国 GDP 占世界 GDP 总量的比例来衡量。一般来说，一国经济地位越靠前，霸权地位越明显，其对外发展援助的总体规模越大。2005年，发援委所有成员国 ODA 总规模为 1067.8 亿美元，其中美国 ODA 总量为 276.2 亿美元，占 DAC 总量的 25.87%；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的 ODA 分别 131.5 亿美元、107.7 亿美元、100.8 亿美元和 100.3 亿美元；排名前五位的五个国家的 ODA 总和占发援委援助总规模的比

人均 GDP 的数据是由 OECD 根据当前价格和购买力平价 (PPP) 汇率计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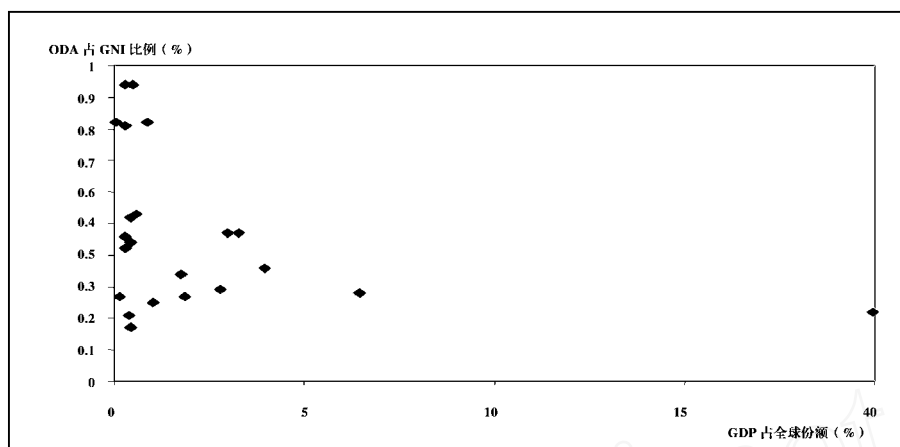
例高达 67.1%。

对 2005 年 21 个发援委国家的 ODA/GNI 比例进行简单考查可以发现，大部分 DAC 国家对外发展援助的相对规模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呈现出正比关系，即一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重要，对外援助的相对规模也越大。但是，美国和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大国，2005 年 GDP 占经合组织国家 GDP 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37.23% 和 11.83%，占世界 GDP 总量的份额分别为 19.97% 和 6.44%，但其 ODA 占其 GNI 的比例分别为 0.22% 和 0.28%，远低于发援委国家平均水平 0.33%，在所有发援委国家中分列倒数第三和第七位。这说明世界主要霸权国家对外发展援助的相对规模与其经济实力并不相称（如图—5、图—6 所示）。



图—5 2005 年发援委国家 ODA/GNI 比例与 GDP 占经合组织国家 GDP 总量的比例

根据经合组织统计注释，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 GDP 总量中不包括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四个国家。



图—6 2005年发援委国家 ODA /GNI比例与 GDP占全球份额

(三) 假说三：一国 ODA /GN 比例与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相关

官方发展援助是各国政府财政支出的一部分，一国政府的 ODA 支出必须以其财政收入为基础。一个国家只有在其财政实力雄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对外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因此，我们认为，ODA 占 GNI 的比重与财政税收占 GDP 的比重成正比，即财政税收占 GDP 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国政府财力越雄厚，该国政府 ODA /GNI 的比例也越高 (如图—7 所示)。2004 年 ODA /GNI 比例最高的挪威、丹麦、卢森堡、瑞典和荷兰五个国家中，ODA /GNI 的比例分别为 0.87%、0.85%、0.83%、0.78%和 0.73%，2004 年其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50.4%、44%、37.5%、37.8%和 48.8%，均明显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35.9%。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当中，瑞典和丹麦是财政税收占 GDP 比重最高的两个国家。也就是说，财政实力雄厚的国家对外进行发展援助的倾向更明显。

2005 年各国 GDP 占全球 GDP 份额的数据为 MF 估计数据。

使用 2004 年的数据是因为 OECD 的 DAC and CRS databases 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 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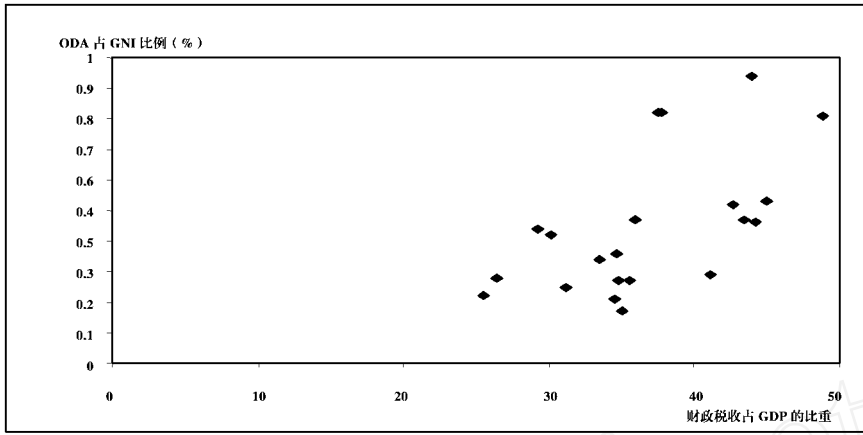


图 7 2004年发援委国家 ODA/GNI比例与财政税收占 GDP的比重

(四) 假说四：一国 ODA/GNI 比例与国内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相关

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重是一项衡量一国政府对维持贫困或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水平的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在民主制度之下，如果一国选民较为关注反对贫困和帮助弱势群体等政治目标，政府扩大对外发展援助的行为才更有可能得到国内选民的支持。因此，ODA/GNI 比例与其国内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重是成正比关系的。如图 8 所示，2003 年 ODA/GNI 比例最高的挪威、丹麦、卢森堡、瑞典和荷兰五个国家，ODA/GNI 的比例分别为 0.92%、0.84%、0.81%、0.8% 和 0.8%，其国内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处于较高的水平，分别为 25.1%、27.6%、22.2%、31.3% 和 20.7%，其中瑞典为经合组织国家中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重最高的国家。因此，

根据 OECD 的定义，公共社会支出包括各种形式的现金补助、直接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形式的实物补助以及因社会目标而进行的减税。公共社会支出的资金流由各级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其中包括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仅包括与社会公共福利相关的支出，不包括由私人慈善机构提供的类似福利服务。一般说来，当今公共社会支出的三个主要流向是养老保险（约为 GDP 的 8%）、卫生领域（约为 GDP 的 6%）和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转移（约为 GDP 的 5%）。

使用 2003 年的数据是因为经合组织发援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 2003 年。

一国公共社会支出相对规模越大，该国对外援助相对支出也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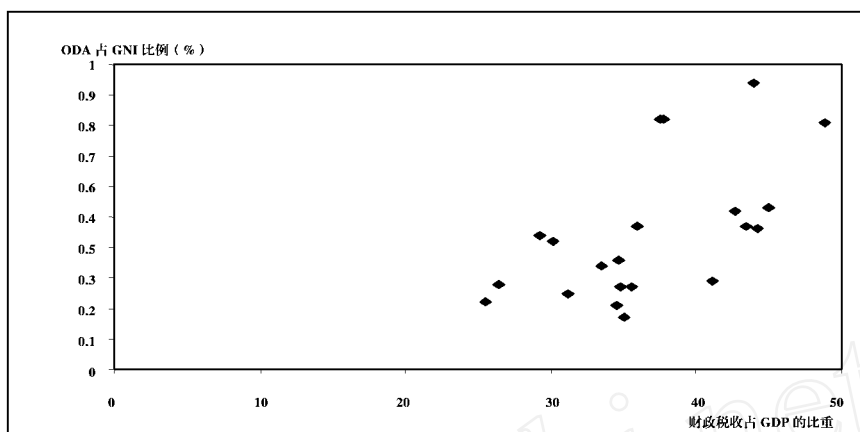


图 8 2003 年发援委国家 ODA/GNI 比例与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重

(五) 假说五：一国 ODA/GNI 比例与财政盈余或赤字占 GDP 比重相关

一国国内的财政收支状况可能会影响其 ODA 的规模，即若一国拥有大量的财政盈余，占其 GDP 比例较高，则其可以提供更大规模的 ODA；若一国财政处于赤字状态，则其提供的 ODA 规模可能受到限制。因此，一国财政净收入占其 GDP 的比例越高，其 ODA/GNI 比例也越高（如图 9 所示）。2005 年，挪威、丹麦和瑞典为 ODA/GNI 比例水平最高的三个国家，其财政盈余占 GDP 的比例分别高达 16.2%、4.6% 和 2.8%，而同期经合组织所有国家这一比例的平均水平是 -2.7%。2005 年，葡萄牙、日本、希腊和意大利为 DAC 成员国中财政赤字最严重的四个国家，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分别 -6%、-5.3%、-5.1% 和 -4.3%，其 ODA/GNI 比例也都属于最低水平之列，分别为 0.21%、0.28%、0.17% 和 0.29%，明显低于 DAC 所有国家 0.33% 的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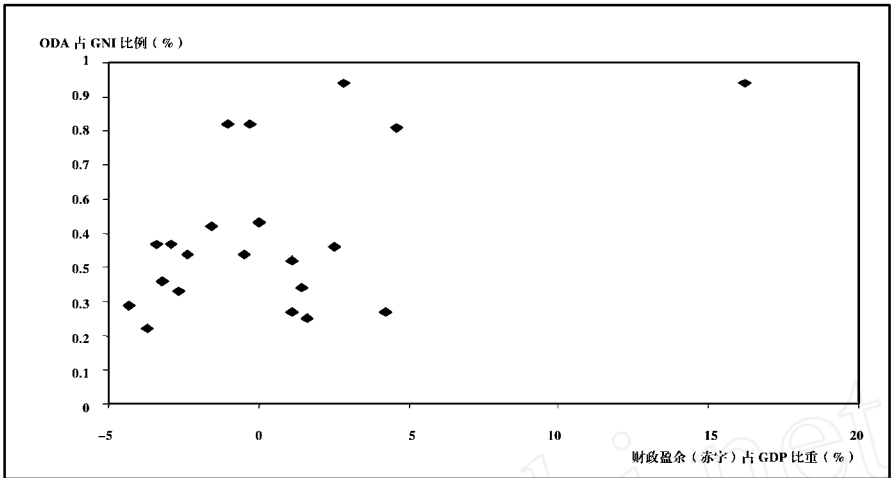


图 9 2005年发援委国家 ODA/GN 比例与政府财政赤字或盈余占 GDP 的比重

(六) 假说六：一国 ODA/GN 比例与该国开放度或对外投资占 GDP 的比重相关

一国进行对外发展援助可能由于其外交政治考虑，也可能是由于确保其贸易和投资利益等经济因素的考虑，同时也可能是两种因素的结合。如果一国与世界各地存在广泛的国际贸易联系或者该国在世界其它地区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并且这种贸易和投资对该国至关重要，则该国很有可能会为这些地区的国家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以确保其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利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考察 ODA/GN 比例与该国国际贸易占 GDP 比重（即经济开放度）之间的关系（如图 10 所示）。发援委成员国中开放度最高的四个国家是卢森堡、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2005 年这些国家开放度分别为 148.6%、86%、74.9% 和 66.1%，而 2005 年这些国家的 ODA/GN 比例也处于较高水平之列，分别为 0.82%、0.53%、0.42% 和 0.82%。而发援委成员国中开放度最低的四个国家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希腊，2005 年这些国家开放度分别为 13.4%、13.8%、21% 和 22%，而 2005 年其 ODA/GN I

比例也处于最低水平之列，分别为 0.22%、0.28%、0.25%和 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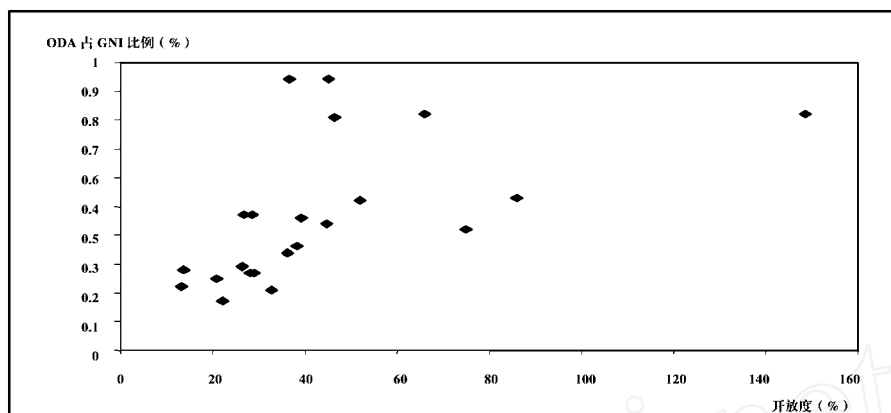


图 10 2005 年发援委国家 ODA/GN 比例与开放度

(七) 假说七：一国 ODA/GN 比例与历史因素（是否为殖民宗主国等）相关

一国 ODA/GN 比例还与该国历史因素有关，例如该国历史上是否是殖民宗主国，因为殖民宗主国与其殖民地国家有着更多的战略利益相关性，倾向于对其原殖民地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另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历史因素，例如美国出于其战略利益考虑，一直以来对中东地区（尤其是以色列和埃及等国）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

四、ODA 决定因素模型的设定与数据来源

根据前文的假设和对散点图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一国 ODA 占 GNI 的份额可以由该国人均 GDP、经济地位、财政收入、国内公共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状况、经济开放度和历史因素（是否为殖民宗主国等）等因素来解释。下文将通过分析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21 个成员国 1990 年—2005 年间的的面板数据，考查发达国发展援助相对规模的决定因素及其有多大的

影响。

(一) 建立 ODA 相对规模决定因素模型

本文旨在考查各解释变量对 ODA 相对规模的影响，因而可以把各援助国之间的个体影响通过截距项的不同来体现。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 ODA 决定因素变截距模型：

$$AD_{jt} = \alpha_j + \alpha_1 GDPPC_{jt} + \alpha_2 GDPSH_{jt} + \alpha_3 TAXH_{jt} + \alpha_4 PUBSH_{jt} + \alpha_5 DEFSH_{jt} + \alpha_6 OPESH_{jt} + \alpha_7 COLO_{jt} + u_{jt} \dots\dots\dots (1)$$

其中，AD 为各国 ODA 占 GNI 的比重，单位为万分之一；GDPPC 为各国人均 GDP，单位为 1000 美元；GDPSH 为各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单位为百分之一；TAXSH 为各国财政税收占 GDP 的比重，单位为百分之一；PUBSH 为各国公共社会支出占各国 GDP 的比重，单位为百分之一；DEFSH 为各国财政赤字或者盈余占 GDP 的比重，单位为百分之一；OPESH 为各国经济开放度，单位为百分之一；COLO 为虚拟变量，用 0 和 1 表示，其中 1 表示曾经是殖民宗主国；u 为残差项。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本文建立的是变截距模型，即把各援助国之间的个体影响通过截距项的不同来体现，从而考查各解释变量对 ODA 相对规模的影响。但是该模型具体是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Fixed Effect) 还是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 (Random Effect)，则需要通过豪斯曼 (Hausman) 检验来判断。

如果是固定效应模型，则模型表达式为：

$$AD_{jt} = \alpha_j + \alpha_1 GDPPC_{jt} + \alpha_2 GDPSH_{jt} + \alpha_3 TAXH_{jt} + \alpha_4 PUBSH_{jt} + \alpha_5 DEFSH_{jt} + \alpha_6 OPESH_{jt} + \alpha_7 COLO_{jt} + u_{jt} \dots\dots\dots (2)$$

本文考查的 21 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除欧盟委员会以外，DAC 有 22 个成员国，其中因数据缺乏，未将希腊计算在内。



其中，为截距项中的常数项部分，所有国家均相等；为跨截面变化的常数，体现各国的个体影响。

如果是随机效应模型，则其公式设定如下：

$$AD_{jt} = \alpha + \beta_1 GDP_{PCjt} + \beta_2 GDP_{SHjt} + \beta_3 TAX_{Hjt} + \beta_4 PUB_{SHjt} + \beta_5 DEF_{SHjt} + \beta_6 OP_{ESHjt} + \beta_7 COLO_{jt} + v_j + u_{jt} \quad \dots \dots \dots (3)$$

其中，为截距中的常数项部分，所有国家均相等；而为截距中的随机变量部分，代表各国的个体随机影响。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中，21个国家 ODA 占 GN 比重、人均 GDP、财政税收占 GDP 比重、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财政盈余或赤字占 GDP 比重以及经济开放度六项均来自 OECD 统计数据。另外，21 个国家 GDP 占世界 GDP 总量的数据来自 MF's WEO Database。各国是否为殖民宗主国则是参照阿森 (R. Ahsan) 的标准。为了本文分析需要，本文将数据进行两年平均，共分为八期，即 1990—1991 年、1992—1993 年、1994—1995 年、1996—1997 年、1998—1999 年、2000—2001 年、2002—2003 年、2004—2005 年。

表一1对本文研究的各项数据统计量进行了概要地描述，除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重外，其它各项指标的观测值均为 168。

由于 ODA 占 GN 比例一般在 1% 以下，单位取百分之一时得到的数据较小，所以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取万分之一。

根据阿赫森，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均只有一个殖民地国家，本文按非殖民宗主国处理。见 R. Ahsan, "The Determination of Foreign Aid and Its Impact on Recipient Countries,"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with Honors in Economics of Williams College*, May 2007.

其中，财政税收占 GDP 比重为 1990 年至 2004 年的数据，最后一期（2004—2005 年）以 2004 年的数据代替。而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为 1990 至 2003 年的数据，所以该项数据没有最后一期平均数据（2004—2005 年），一共只有 7 期。

表—1 各项数据统计量

变量	观察值	组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ODA	168	21	42.6339	25.8785	115	10
GDP	168	21	25.2761	7.8177	67.544	11.7995
PSH	168	21	2.5645	4.565	21.561	0.0505
TAX	168	21	37.4414	6.8399	52.35	25.5
DEF	168	21	-1.592	3.8670	14.6	-11.4
PUB	147	21	21.7442	4.8968	35.6	11.3
OP	168	21	38.4848	24.3327	143.25	8.3

注：(1) ODA 占 GN 的比重数据单位为万分之一；(2) 人均 GDP 数据单位为 1000 美元；(3) 其余数据单位均为百分之一。

五、ODA 决定因素模型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

(一) 变量相关性分析

鉴于从直观上判断，本文研究中各变量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首先需检验各变量的相关性。

我们分别对 21 个国家 7 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得到各国 ODA 占 GN 的比重、人均 GDP、财政税收占 GDP 的比重、公共社会支出占各国 GDP 的比重、财政赤字或者盈余占 GDP 的比重以及经济开放度七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除个别国家个别变量相关系数大于 0.98 以外，其它国家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明显小于 0.98。从总体上看，各变量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限于篇幅，21 个国家的相关系数矩阵不一一提供，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其中，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和意大利人均 GDP 与 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之间相关系数大于 0.98，日本人均 GDP 与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之间、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与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 0.98。

(二) Hausman 检验

本文模型具体是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还是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可以通过 Hausman 检验来判断。在 Eviews 5.1 中，只有随机效应估计结果下才可以进行 Hausman 检验。

因此，我们假设模型为随机效应模型，对 (3) 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如表 2 第 (1) 列。然后再进行 Hausman 检验，得 Hausman 检验统计量 32.06 (见表 2 第 (1) 列)。由此可知，本文应建立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当为固定效应模型时，无法对含有虚拟变量的方程进行估计，因此我们把虚拟变量 COLO 去掉，得调整后的模型如下：

$$AD_{jt} = \alpha_j + \beta_1 GDP_{PCjt} + \beta_2 GDP_{SHjt} + \beta_3 TAX_{SHjt} + \beta_4 PUB_{SHjt} + \beta_5 DEF_{SHjt} + \beta_6 OPESH_{jt} + u_{jt} \quad \dots\dots\dots (4)$$

(三) 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分析

考虑到各国对外援助的结构和决策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所以使用 GLS 法 (cross-section weights) 对固定效应模型 (4) 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 第 (2) 列，为 0.9681，而根据 t-统计量来判断，6 个解释变量系数以及截距项中的常数项只有 3 个系数 (GDP_{SH}、DEF_{SH} 以及 OPESH) 是显著，其余 4 个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因此，初步判断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仔细考查 TAX_{SH} (财政税收占 GDP 比重)、PUB_{SH} (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 和 DEF_{SH} (财政赤字或者盈余占 GDP 比重) 三个变量，发现存在这样一个等式：

$$DEF_{SH} \text{ (财政盈余或赤字占 GDP 比重)} = TAX_{SH} \text{ (财政税收占 GDP 比重)} - PUB_{SH} \text{ (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 + \text{其它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由此可知，这三个变量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为了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对估计模型 (4) 进行调整，只包含以上三个变量中的两个变量，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新的估计模型，具体估计

方程如下：

$$AD_{j,t} + \beta_j + \beta_1 GDP_{PCj,t} + \beta_2 GDP_{SHj,t} + \beta_3 PUBSH_{j,t} + \beta_4 DEF_{SHj,t} + \beta_5 OPESH_{j,t} + u_{j,t} \dots\dots\dots (5)$$

$$AD_{j,t} + \beta_j + \beta_1 GDP_{PCj,t} + \beta_2 GDP_{SHj,t} + \beta_3 TAXSH_{j,t} + \beta_4 DEF_{SHj,t} + \beta_5 OPESH_{j,t} + u_{j,t} \dots\dots\dots (6)$$

$$AD_{j,t} + \beta_j + \beta_1 GDP_{PCj,t} + \beta_2 GDP_{SHj,t} + \beta_3 TAXSH_{j,t} + \beta_4 PUBSH_{j,t} + \beta_5 OPESH_{j,t} + u_{j,t} \dots\dots\dots (7)$$

同样考虑到各国对外援助的结构和决策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继续使用 GLS法 (cross-section weights) 对模型 (5)、(6)、(7) 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分别见表 2第 (3)、(4)、(5) 列。

模型 (5) 的估计结果为表 2第 (3) 列，为 0.968，但根据 *t*统计量的结果，GDP_{PC}和 PUBSH₂个解释变量系数以及截距项中的常数项统计上仍不显著。

同样，模型 (6) 的估计结果为表 2第 (4) 列，为 0.951，但根据 *t*统计量的结果，TAXSH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截距项中的常数项统计上仍不显著。

而模型 (7) 的估计结果为表 2第 (5) 列，为 0.968，具体结果如下：

$$AD_{j,t} = 32.39 + \beta_j - 0.38GDP_{PCj,t} + 9.63GDP_{SHj,t} - 1.25TAXSH_{j,t} + 1.09PUBSH_{j,t} + 0.45OPESH_{j,t}$$

(12.01) (0.14) (2.59) (0.32) (0.33) (0.13)

$$R^2: 0.968; \text{ Adjusted } R^2: 0.9619$$

其中，为跨截面变化的常数，体现各国的个体影响。鉴于本文并不考查各国的个体影响，因此结果从略。根据 *t*统计量的结果，5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截距项中的常数项均在 1%的统计水平是显著的。因此，模型 (7) 是一个能够较好地用援助国的各种因素来解释 ODA 相对规模的模型。

由上面的估计结果可知，一国 ODA 占 GNI 比重与该国的经济地位、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以及经济开放度成正比，与该国人均 GDP 水平和财政收入成反比；而财政盈余或者赤字水平对 ODA 相对规模并没有影响。

具体来说，人均 GDP 每增加 1000 美元，ODA 占 GNI 的比重将下降 0.0038 个百分点；GDP 占全球份额每上升 1 个百分点，ODA 占 GNI 的比重

将上升 0.096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每上升 1个百分点，ODA 占 GN 的比重将下降 0.013个百分点；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每上升 1个百分点，ODA 占 GN 的比重将上升 0.011个百分点；经济开放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ODA 占 GN 的比重将上升 0.0045个百分点。

表—2 ODA 相对规模决定因素模型面板数据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固定或随机效应	Random Effect	Fixed Effect	Fixed Effect	Fixed Effect	Fixed Effect
常数项	- 11.9912 (17.3906)	- 22.7268 (14.0365)	- 11.6678 (11.084)	- 21.421 (13.208)	32.3873 * (12.0062)
GDPCC	- 0.1431 (0.2194)	0.1394 (0.1726)	0.068 (0.1646)	0.3921 * (0.1291)	- 0.3833 * (0.1408)
GDP SH	0.557 (1.0169)	11.0817 * (2.3832)	12.029 * (2.2842)	10.039 * (1.8236)	9.6321 * (2.5856)
TAXSH	1.0856 * * (0.5218)	0.5873 (0.4507)		0.2286 (0.2945)	- 1.2491 * (0.3206)
PUBSH	- 0.2982 (0.5509)	- 0.5226 (0.4278)	- 0.0692 (0.2567)		1.0903 * (0.332)
DEF SH	- 1.4224 * (0.3546)	- 1.6961 * (0.2815)	- 1.4478 * (0.2071)	- 1.6622 * (0.2059)	
OPESH	0.5363 * (0.138)	0.5065 * (0.1235)	0.527 * (0.1233)	0.4468 * (0.1076)	0.4525 * (0.1258)
COLO	- 2.7678 (9.8619)				
R2	0.2057	0.9681	0.9678	0.9511	0.9684
Adjusted R2	0.1657	0.9612	0.9611	0.9425	0.9619
F检验值	5.1426	140.0159	145.3563	110.5205	148.2401
Hausman 检验值	32.0616 (0.0000)				
观测值	147	147	147	168	147
组数	21	21	21	21	21

注：(1) 括号内为标准差；(2) *、* *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和 5%。

一国 ODA 占 GN 比重与该国的经济地位成正比说明，一国经济地位越

强，其援助相对规模越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主要霸权国家美国和日本 ODA 相对规模低于其它发达国家，而若干北欧小国的对外发展援助规模则远高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比重（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的 ODA /GN I 比例都超过了 0.7%）。

一国 ODA 占 GN I 比重与该国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以及经济开放度成正比，说明一国对外援助的相对规模既受政治因素影响，同时也受经济因素影响，是经济和政治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一国 ODA 占 GN I 比重与该国人均 GDP 水平和财政收入成反比则说明，富国或者财政收入充裕的政府并不一定比穷国或财政收入紧张的国家援助倾向更强，相反可能更不愿意提供援助。这似乎与前面散点图分析的结果并不一致。但进一步分析 2000 至 2004 年 5 年期间的散点图，如果不考虑五个 ODA /GN I 比例超过 0.7% 国家（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其余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其 ODA 相对规模之间关系并不明显，没有表现出正向关系，因此经验分析的结果与我们简单分析的结果其实并不冲突。此外，散点图只考查两个变量的关系，没有考虑其它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导致其结论可能是有偏差的。

另外，财政盈余或者赤字水平对 ODA 相对规模并没有影响，这主要是各国政府的财政盈余或赤字水平主要是由国内各种因素决定的，而 ODA 援助额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对较小，因此各国政府的财政盈余或赤字水平不会影响 ODA 的相对援助规模。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经验分析结论

一国对外援助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借助 21 个 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在 1990 至 2005 年间的数据库，利用计量模型估计了影响对外援助支出相对规模的因素。分析表明，一国 ODA 占 GN I 比重与该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以及经济开

放度成正比，与该国人均 GDP水平和财政收入成反比。这说明，一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重要，对外援助相对支出越多；一国选民对社会政策目标越关注，该国的对外援助相对支出也越多；但是，富国并非更乐善好施，财政收入充裕的政府也不会比财政收入紧张的政府援助倾向更强。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因素解释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经验支持，这说明在冷战之后，各国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指导思想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具体来说，人均 GDP每增加 1000 美元，ODA 占 GNI的比重将下降 0.0038个百分点；GDP占全球份额每上升 1个百分点，ODA 占 GNI的比重将上升 0.096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每上升 1个百分点，ODA 占 GNI的比重将下降 0.013个百分点；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比重每上升 1个百分点，ODA 占 GNI的比重将上升 0.011个百分点；经济开放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ODA 占 GNI的比重将上升 0.0045个百分点。

（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对外发展援助是中国可持续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具体实施措施之一。因此，中国需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援助原则和措施。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 OECD 的 DAC成员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上文对 DAC国家发展援助的初步分析给我们的启发是，一国对外援助的最优规模应根据各国国内的具体情况而定。对中国而言，由于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其占全球经济的比例不断提高，而且目前中国是一个对外开放程度相当高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责任的上升，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支出必然会有相应的增加。随着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目标的提出，我们还会看到对国内的公共社会支出和对贫穷国家的对外援助支出会同时增加，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关心世界贫困国家人民福利的前提是关心本国人民的社会福利。当国内的公众对社会目标更加关注之后，也会影响到该国的政治家在更广泛的国际视野内实现大众所关注的目标。

近些年来，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援助越来越多，在对外援助上表现得相当活跃。截至 2006 年底，我国共向 100 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帮助受援国建成各类项目约 2000 个；在 60 多个国家实施了 100 多个优惠贷

款项目；向 110 多个国家无偿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为 100 多个国家培训培养了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 2.3 万人。另外，中国政府已与亚、非、拉美和南太地区的 46 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这些国家对华部分到期债务。考虑到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增长速度快，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外部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有必要相应地增加对外发展援助的规模：

首先，可以考虑适当整合中国的对外援助。当前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形式包括赠与、无息贷款、援外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和援外合资合作基金等。由于种类复杂、管理多头，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使得我国对外发展援助缺乏统一的口径。建议对当前各种渠道的对外发展援助进行整合，取消原来的分类，重新划分为无偿援助和援助贷款两类，按照国际准则计算优惠程度。

其次，要根据经济发展前景制定分阶段的对外发展援助目标。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增大和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可以预计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将会提高，因此，政府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渐提高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

最后，由于对外援助受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和公共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的影响，因此不能盲目扩大对外发展援助，而是要与国内的财政收入和公共社会支出相协调。

黄海波：《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现状和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6期，第4—11页。

作者简介

李莉 印度尼西亚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1991和2002年在国际关系学院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1—2003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事中东政治和美国外交研究。代表作有“China'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China Report* (Sage Publications), No. 1, Vol. 41, 2005。

电子信箱: jasm ineli3@ yahoo. com

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2003和2006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战略与管理》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电子邮箱: guoyousong@ fudan. edu. cn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1993年在海南大学获国际贸易专业学士学位, 1996和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2000年在哈佛大学进修。著有:《失衡之困》(2007年)、《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2007年)。

电子信箱 hefancass@ gmail. com

唐岳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2006年在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yuehuatang@ gmail. com

朱中博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2005年在山西大同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chestnut7766@ yahoo. com. cn

汪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2和1989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先后获俄罗斯语言文学学士、社会学硕士学位, 200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做访问学者。著有:《俄罗斯私有化评说》(2001年)、《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2005年)。

电子信箱: wangn@ shisu. edu. cn

林民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2003年在中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译有:《战略经济学》(2006年)。

电子邮件: linn inwang991@ 126. com